

Китай-Росс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зарубежье XX-XXI в.в.

20—21世纪之交 中俄教育改革比较

策 划 Н. Е. 鲍列夫斯卡娅

主 编 朱小蔓

Н. Е. 鲍列夫斯卡娅

В. П. 鲍利辛柯夫

助理主编 张男星

教育科学出版社

Китай-Росс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зарубежье XX-XXI в.в.

20—21世纪之交 中俄教育改革比较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葛 都 张 羽 乔焕臣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徐 虹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21 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 / 朱小蔓, (俄罗斯)
鲍列夫斯卡娅, (俄罗斯) 鲍利辛柯夫主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41-3434-1

I. 20... II. ①朱... ②鲍... ③鲍... III. 教育改革
—比较研究—中国、俄罗斯—21 世纪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15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228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3.2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500 千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印 数	1—1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合作研究得到
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的支持与资助

©Н. Е. Боровская, 2006

©Чжу Сяомань, 2006

©В. П. Борисенков, 2006

©Чжан Наньсин, 2006

序

周 济*

今年是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周年，又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五周年。在这样的时刻，中俄两国政府决定共同举办“国家年”，即分别于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于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系列活动。这对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为两国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一书，是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两个国家级教育研究机构分别组织两国教育学者历经几年努力形成的合作成果，也是为中俄“国家年”做出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在发展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和办学方向。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二是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四是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五是坚持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六是坚持依法治教，提高教育管理能力。

这些教育发展的方针和任务，既反映了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同时又要求我们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研究世界

* 周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各国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对象之一。

中俄是两个大国。两国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会产生重要影响；两国的教育发展，对人类的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探索性和启发性作用，这本《20—21 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专著，正是中俄两国学者为此探索所做的一份重要工作。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教育部感谢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以及俄罗斯各位专家们为此项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在这项合作中所显示出来的，中俄两国学者对教育葆有的热情以及彼此的友好信任，既是中俄两国在教育方面深厚联系的延续，也是中俄两国进一步发展教育合作研究的保障。

衷心祝贺本书的出版，也热情盼望有更多中俄教育合作研究的成果面世，真诚期待两国以互办“国家年”为契机，推动中国和俄罗斯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上一层楼！

致

辞

——在中俄学者“21 世纪初期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究”
北京研讨会上的讲话

章新胜*

尊敬的中俄两国的专家、学者：

刚才朱小蔓所长与鲍利辛柯夫院长的讲话都极富诚意，也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我听了很受启发。

各位，今天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出席此次中俄教育交往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与各位中俄教育界的专家相识。大家知道，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共同主持中国“俄罗斯年”的开幕仪式，本次研讨会在它的前一天举办，这既是一个偶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从偶然之中见到必然，说明教育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教育决定未来。

正如鲍利辛柯夫院长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俄两个伟大的国家，在教育领域进行如此广泛、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其涉及范围之大，不仅是两国恢复了曾中断 20 多年教育交往后的第一次，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甚至是中俄两国教育界在世纪之交以来与世界交往史上的第一次。今天是十分重要的日子，也是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向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同行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此，我想谈两方面意见。

一、2006 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 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和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当今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重大举措。

* 章新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

“21 世纪初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究”课题是中俄两国教育合作分委会框架下的一个项目，也是中俄“国家年”的活动项目之一。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知识经济社会的悄然走来，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教育的改革及其国际化进程成为各国领导者普遍关注和首选的议题之一。作为中俄两国教育合作委员会教育分委会的中方主席，我十分感谢两国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此项目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俄两国，对亚洲和欧洲，而且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俄互办“国家年”，表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进入历史的新阶段，办“国家年”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恐怕也是首次。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否可持续发展，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中国有句古话，“温故而知新”。在我看来，两国关系经历曲折和风雨之后在今天能够快速全面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思想文化交流、人文和心灵交流进行得既早而又广泛和深入。2500 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为全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学者们所谈到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学方法等，对中国的现代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俄教育交流在俄罗斯也处处得以体现。刚才鲍利辛柯夫先生就曾回忆到，当年在他就读大学的班级里，4 个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同学。今天，在中国的许多高校内都可以见到俄罗斯的学生和学者；北京大学与莫斯科大学，黑龙江大学与远东国立大学分别合作举办研究生院便是这一交往合作的又一明证。我们在教育和人文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的，必将对以今明两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为新的起点的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起到积极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因为一切合作不仅是利益相关，更要以思想和心灵的交流和互信为基础，都是要通过人去实现的。

当我们回顾历史，看到现在的发展，展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必将起到基础、综合和先行的作用。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经济贸易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已经达到 300 亿美元，今后还要增长。但是，经济贸易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和合作，归根到底是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心灵的交流分不开的，只有互信、思想和心灵之间的沟通，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才禁得起暴风雨的冲击。所以，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二、中俄教育比较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并且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互补性，这将为中俄两国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我不是教育家，

但从外部来看，这种可比性首先在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远亲不如近邻，地理上两国又有长达 43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而且两国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十分深刻的革命，不论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波澜壮阔的，对于人类历史，对于世界的变化，对于二战反法西斯战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两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遇到了很多机遇和挑战，也遇到了不少带有共性的问题，也都各自取得了新的成果和进展。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时代是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它深层地影响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正如我刚才和院长先生所探讨的那样，欧盟所倡导的博洛尼亚教育进程以及支撑它的伊拉姆斯计划、苏格拉底计划等，对我们各自都产生了难以避免的影响，都有需要我们沉着冷静地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同时，科技的日新月异，信息化和知识社会的到来，全球化、信息化对所有的教育与教学带来的变化也是空前的。我想，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经历的。对我们两国来说，我们还面临着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和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些对教育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两国都处在从来没有过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汪洋大海中。同时，两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民主与法制的进程。粗略概括起来，两国的可比性和互补性程度，是其他任何两个国家都难以达到的。

最后，在我结束讲话时，我赞同专家学者们的发言，这次研讨会非常开放，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双方都非常坦诚。把教育放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比较，意义非凡，这将对两国教育甚至人类教育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同时希望我们的比较研究对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建议。

谢谢！

前

言

朱小蔓*

本书是“21 世纪初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究”课题的成果。2006 年是中俄两国政府互办“国家年”的“俄罗斯年”，恰逢此时，中俄两国学者共同奉上这部研究专著，我们感到十分的喜悦。

2003 年 10 月，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在莫斯科签订了“2003—2006 合作协议书”。在此基础上，该课题最初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妮娜·鲍列夫斯卡娅向我提议、策划，经我们共同多次反复地讨论之后，被正式列入中俄合作计划；并由我来担任课题的中方负责人，俄方负责人经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尼康得罗夫院士批准，由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鲍利辛柯夫院士和妮娜·鲍列夫斯卡娅教授共同担任。课题研究于 2004 年 5 月正式启动。

这项合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级教育研究机构在教育领域内第一次涉及内容极其广泛的大型合作研究，两国学者分别就划定时段内，中俄两国教育的重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内容涉及 11 个重大的教育领域：1. 教育战略改革；2. 教育管理改革；3. 教育财政改革；4. 区域教育改革；5. 课程改革；6. 高等教育改革；7. 职业教育改革；8. 私立教育改革；9. 德育改革；10. 教师教育改革；11. 教育交流与服务改革。双方学者努力展示各自国家的改革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分析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内部推动因素，跟踪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困难，力图透过两国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探索两国分别在自己认定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进行教育改革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把握各自的民族文化和教育战略取向的国情特点。

* 朱小蔓，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教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

11个主题的研究都分别包含“中国部分”、“俄罗斯部分”以及“中俄比较部分”，分别由相应领域的中国学者和俄罗斯学者撰写，并在此基础上再由比较教育学专家撰写总结性比较结论，最终形成研究专著，我们约定该论著在两国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出版，并争取用英文出版，向国际社会展示。

从动议到中文专著的出版，历时近三年时间，两国学者为此数易其稿、反复交流磋商，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其间，妮娜·鲍列夫斯卡娅博士和鲍利辛柯夫院士数次来到北京，我也于2005年4月前往莫斯科，就课题设想、研究计划、写作方案等问题进行反复细致地讨论和确认。2006年3月，俄方十多位参与研究和撰稿的学者来到北京，与中国学者共同举办了“21世纪初期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讨会”，双方在写作初稿的基础上，直接面对面地深入对话、沟通与切磋，彼此都感到很有兴趣，很有意义，也很有收获。

作为中方主编，我的心情主要是欣慰和感动。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是从小读着苏联文学作品、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当时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成就激动和鼓舞着我们的青春生命，深深地模塑着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人生信念和行为方式。这与今天的时代对当代人的影响不同。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各国之间多向互动的特点日益增强，当代人从中感受到的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是对人类科技文明的共享共创。但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往日的大苏联已不存在，中国也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交往和友谊也会永远留在人类文明史上，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西方话语的盛行，俄罗斯教育及教育学术在中国的传播日渐稀疏和薄弱，这种状况无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视野及参照而言，还是就国家发展的战略及政治安全而言都是不利的。因此，我相信，着手做这件事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深具历史价值。

为此，我诚挚地感谢参与本研究的中国教育学术界的同行朋友们，他们多在自己所专攻学术领域中有重要的作用，其学术及各类社会公务十分劳碌。两年多来，不断地打扰他们令我不安，更让我感动。其中有著名学者张力、谈松华、靳希斌、谢维和、钟启泉、胡建华、王长纯、邬大光、谢安邦、周满生，以及杨银付、石卫林、王炳明、李庆丰、何雪莲、刘次林、张男星等年轻学者。我还要向顾明远教授为本书撰写总结性比较表示真诚的敬意和谢意。同时，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会长 Mark Bary 教授也已允诺为本书撰写一份总结性的比较，虽然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来得及赶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与读者见面，但我仍然非常感谢他，相信读者在不久的将来会读到他的重要比较见解。在这里我也要向合作研究的俄罗斯著名学者表示感谢，他们是 Арефь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Леонардович、Бацин 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Борисен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нтелеймонович、Боревская Нина Ефимовна、Вильсон 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Вифлеем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Вульфсон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Гукаленко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Давыдов Ю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Давыд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Юрьевич、Данилюк Александр Ярославович、Ерош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Жура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лячко Татьяна Львовна、Левицкий Михаил Львович、Розов 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ович、Рыжаков Михаил Викторович、Смирнов Игорь Павлович、Ткаченко 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我要对尊敬的陈至立国务委员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感谢她高度重视和关注我们这项研究，批准将其列入中俄“国家年”的项目计划。衷心感谢教育部周济部长在百忙中为本书赐序，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衷心感谢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亲临中俄两国学者的研讨会，并发表高屋建瓴、意义深远的讲话，使我们两国研究者都深受启发，深受感动。除此之外，我要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致谢，向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致谢，他们的远见与理解，以及慨然为该研究立项与资助，都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张男星博士，作为助理主编，两三年来几乎所有的联络与沟通以及初步阅稿和翻译审校工作都是由她先承担的。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参与这项复杂的工作，固然于人生是锻炼且十分有意义，但毕竟需要奉献精神 and 意志品质。此外，还有许多参与俄文著述翻译的专家们的无私与热忱，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和辛苦，我无法尽数，在此一并向大家致谢、鞠躬。

愿我们为共同合作完成了这件多年来不敢想、未曾做的事情而忘却疲惫，愿这部凝聚大家心血的著作为中俄教育改革研究，为中俄两国今后进一步的深入交流、合作奠定新的基础。

导

言

B. П. 鲍利辛柯夫* B. Л. 武尔松**

现代世界的图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变化。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关系以及人类生活本身，在一代人的生命期限内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成为人类广阔活动领域之一的教育，它的动态发展业已有机地加入到这些变化之中。教育与其他社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教育的状况和效率成为表征一个国家在发展水平、世界地位、竞争能力、国际威望等方面的重要指标。但是，教育又不单纯是反映人类共同体状况的镜子。教育更可以被比作放大镜，因为教育能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反映和表现出社会发展的矛盾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使其变得一目了然。

全球化，这是社会生活国际化过程的最新阶段，已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特点。在这个阶段，作为一种整体机制的全球经济正在形成，劳动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文化的联系正在扩大。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导致跨国社会的形成。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之间日益扩大的彼此接触，经济和社会文化模式在民族国家界限内逐渐增多的“输出”和“输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国际比较的兴趣。科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方向——比较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对不同国家和地理政治区域的社会过程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比较教育学属于比较语言学。比较教育学主要从比较的角度，将各国和地理政治区域内的教育发展状况、基本趋势和发展规律，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普遍趋势和各个国家或区域的特点，以及它

* B. П. 鲍利辛柯夫，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 B. Л. 武尔松，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教育科学院教育理论和教育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国际教育经验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以及各国教育文化相互丰富的方式。

指向世界教育、教学经验的研究不可能由比较教育学来独自完成。某些有意义的国际比较是在教育科学的其他领域（例如，教学论）内进行的，也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得到研究。这样的一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现代世界教育问题的认识，而比较教育学利用它们的资料去更有效地履行比较所特有的职能。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性使它更有可能发现，学校、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在对年轻人个性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方面的协作效应。

就比较教育学所研究问题的广度而言，它接近于教育史，但与教育史不同的是，它更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现代的现象和过程。“现代性”这一概念，没有严格规定的内容，可以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但当谈及复杂的社会过程时，就不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能用快照抓拍下来的东西。在本研究中，“现代性”指的是最近二三十年。在这段时期内，俄罗斯和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向教育系统提出新的要求。当然，研究它们并不排除对更遥远过去的历史作一番阐述，但是，对于比较语言学而言，对历史的阐述并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而主要是用它来解释某个现代现象的根源。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对刚刚过去的十来年所进行的改革及其结果做出评价。

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的本项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建立于对中俄两国的教育及其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基本发展趋势进行多样性比较的基础上，其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世界大国，它们本身的规模足以使它们成为成功的比较对象。两国在地域上接近，具有漫长的边界线（长达4300多公里），这就为卓有成效地发展经济合作和贸易创造了条件。而在更宽广的意义上说，这是为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在苏联时期又具有了全新的性质。当时的苏联，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支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共同性又把中苏两国连接在一起。在20世纪50年代，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包括参与工厂的建设，参与熟练的科学人才、工程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培养。许多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高等学校接受培养，通过了候补博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当时苏联和中国之间已经在积极发展教育科学领域内的合作，首先是在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内的合作，其标志是杰出的苏联学者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了中文。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在继续俄中两国学者相互合作和彼此补充的传统，这令人十分振奋。

这项合作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分析了各自国家中教育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但在这之前先制定了统一的结构，拟定了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两国学者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这项合作研究最适宜的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怎样把我们两国在理解上很不相同的全部概念简化成某种“公分母”呢？最后（这里的最后不是最不重要），如何使参与研究人员的立场和观点达成必要的一致性呢？

在某些比较教育学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必须首先解决复杂的方法论问题，然后才能够着手研究具体的任务。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它的潜在危险就是进行烦琐的、收效甚微的哲学，与被研究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非常弱。我们推崇的是，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应该直接在对内容的比较研究进程中进行。俄罗斯和中国学者遵循的正是这一思想。他们努力的成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合在一个封皮下的两部不同的著作，而是严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成果。在这项成果中可以看到，对我们两国教育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深刻比较，是有机地放置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各自国家的教育背景之中的。

无论是社会科学的对象还是社会科学的职能，都不可能永远绝对不变。它们必然会发生变化并要求以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取决于所要研究的现实本身在进步，也取决于科学知识自身的进步。还在不久以前，教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普通教育学校，对其他教育制度的研究只是捎带进行。当时的整个教育学在相当程度上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而本书的作者们从扩大比较对象领域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教育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并对俄罗斯、中国与国际教育组织的合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对无数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其中包括两国的法律和政府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等等。使用这些基本文件的目的是，准确认识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义务教育的期限和形式、各种不同类型教学机构的任务和性质、学生的招生和毕业条件、教师发展的法律规定、教育拨款的形式和数量……由于法规文件往往是在一定场合下反映某些权力机构的意图，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具体的实践发生分歧。所以为了揭示真实的情况，本书各部分的作者把国家的规范法令与其他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些文献资料包括教育文件、社会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期刊、教育研究人员的著作，也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材料和区域性的、世界性的教育文件。

对各国和国际的出版物中所包含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本书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没有这种分析就不可能对俄罗斯和中国教育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和评价，也不可能确定它们在世界教育空间中的地位。学校数量、

学生和教职工人数、居民获得不同类型教育的比例、经费保障——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统计中。任何个别的例子，即使最鲜明、最可信的例子，都不可能代替统计概括，统计概括最终反映个别情况的全部总和。当然，个别教育现象的质的特点和独特的创造性，尤其是它们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在统计数据中似乎消失了，它被溶解在平均统计指标中。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框架内，偶然的偏差得到相互抵消，主导的趋势和规律性才得以揭示。

尽管数量指标很重要，但绝不可以将它们绝对化。本书的作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对数字的盲目崇拜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险途。对于比较研究也是这样。仅仅依靠数据绝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搞清楚一些问题，例如各级教育的继承形式问题，教学科目内容的科学水平问题，教育机构的教育活动目的和方法问题，等等。在现代条件下，数量指标作为恰如其分地评价教育状况的意义已经有所减弱。随着国家的发展，曾被看作是教育进步主要指示器的数量增长，已不再能起到完全而有效评价教育的作用了。对教育粗放式发展所导致的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需要进行深刻的质的分析。

在对不同国家（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教育发展进行比较时，主要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处理好一般与特殊、民族与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问题的范围在扩大，它们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利益并具有了全人类的意义，适时地解决这些问题在客观上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当然，民族的利益和价值观并没有消失，而且，可以假设和预期，全人类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本质界限会逐渐模糊：全人类的价值观将越来越鲜明地染上民族的色彩，而保存下来的民族价值观将越来越充满全人类的内容。

然而，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对全球一体化所拥有的客观能力是不一样的。工业建设或商业领域接受全球一体化比教育系统要容易得多，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和教育自身传统的民族或区域特点始终对教育系统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教育改革比较中对此就有一定的反映，其中即使是最普遍的趋势常常也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

改革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在发达国家，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际上是从不间断的。教育系统不同环节的组织、结构和活动，会经常地随着问题的发生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往往并不能解决逐渐积累起来的越来越尖锐的问题。所以，对进行基础性改革的要求也就强烈起来，基础性改革就是要努力响应时代的号召，不断地对前一阶段的发展做出总结并为今后的积极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最近几十年以来，教育改革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规模。在国外的文献中常常引用“教育改革流行病”这样的语句。确实，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区

实际上都不能置身于这个过程之外。关注教育改革的不仅仅是教育家和教育活动家的职业特征，就连国家政权机构、政党和社会组织也把注意的焦点锁定在教育改革上。

近年来，俄罗斯的许多作家以及官方人士，都在避免使用“改革”这一术语，他们宁可使用“现代化”、“稳定发展”、“动态进步”等术语。这些术语的不同使用还不是因其内容与“改革”一词的差别，而在于词语表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与下述情况相联系，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失败使许多人对“改革”这个词本身产生了不良反应。不过，俄罗斯教育系统内部正在进行的或计划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是完全可以放入教育“改革”范畴的。

以前的教育改革通常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并由圈子很窄的一群高级官员拟订方案。现在的教育改革却吸收了许多研究机构的参与，并邀请知名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去为改革做理论准备。在政府和起领导作用的政党机关的会议上，在国际代表大会上都在讨论改革方案。改革是多方面的，要求对教育系统进行结构改造，更新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环节，促使教育和教学内容、方法的现代化，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世界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形式。改革的方法和形式极其丰富多彩。

对各国教育改革做出否定的评价是需要不少确实的根据的，本项研究的许多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改革过程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常常适应不了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发展变化。改革也不总是建立在牢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以经验主义探索教育发展新途径的过程中，往往呈现一种独特的“生物链”反应。有时候，改革大背景中还交织着匆忙的、不慎重的革新，这种革新根本不可能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趋向完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下建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7年）的报告中指出：“过多的连续不断的革新势必扼杀改革，因为这样做不能为现有制度吸收新思想，并为所有有关方面都能参与改革留有必要的时间。此外，正如过去的失败所表明的，许多改革者采用的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或过于理论化的方法，他们无视从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或否定过去的成绩。”

尽管教育系统的改革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到处都能发现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要求不相一致的地方，虽然形式和程度不一样。对教育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现实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到处都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国家中这个鸿沟还在加深加宽。人获得范围广泛的、真正有价值的、对生活有意义的知识的天赋权利，与传统的教育制度之间的根本性矛盾，没能得到克服。

对所有学生的标准化教学与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兴趣之间的矛盾、科学的逻辑